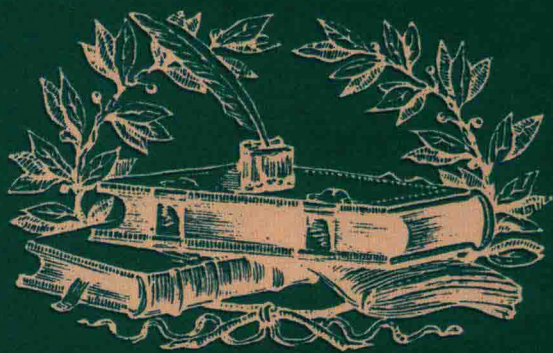




文学翻译与民族建构

形象学理论视角下的《大地》中译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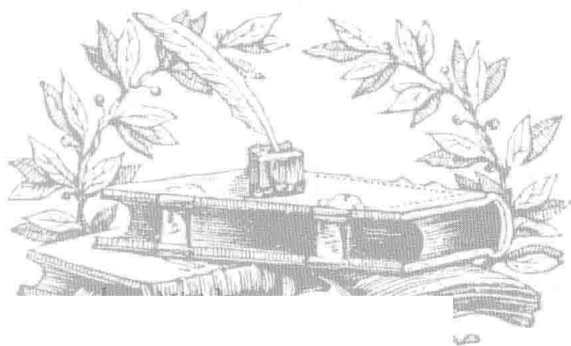


梁志芳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文学翻译与民族建构

形象学理论视角下的《大地》中译研究



梁志芳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与民族建构:形象学理论视角下的《大地》中译研究/梁志芳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7-307-12857-6

I. 文… II. 梁… III. 文学翻译—研究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9890 号

责任编辑:谢群英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5.5 字数: 214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2857-6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本书得到广东省高等学校第八批“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及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出版基金的资助。

代 序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在自外向内的交流过程中，必然涉及将外族、外域文化带入本族、本土，从而有可能扰乱、打乱、打破、甚至颠覆本族、本土文化“纯洁”“安静”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外邦侵犯”行为(*intrusion of the alien*)^①。然而，世界诸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却又表明，作为文化特殊表述形式的翻译，往往在这一民族建构及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世界学术研究领域在过去 30 多年中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广泛关注，翻译(尤指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在民族以及民族形象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逐渐成为国际翻译学界的重要论题。梁志芳博士完成的这部专著《文学翻译与民族建构——形象学理论视角下的〈大地〉中译研究》(下称《文学翻译与民族建构》)，即是反映此研究动向的一部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该书把民族建构和形象学理论与方法引入翻译研究，以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的中国题材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的四个中文全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属于“文化回译”现象的此类中文目标文本如何描述中国、重构目标语民族自我形象(中国形象)，以及译者如何通过中国形象的自我重构，来表达他们对“中国”与“中华民族”的“想象”与期待、对民族形象重构的个人诉求，并分析与探讨

^① Robyns, Clem. Translation and Discursive Identity. *Poetics Today*, 1994, (3): 405-428.

《大地》目标文本如何参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形象建构或重构这一工程之中。可以说,《文学翻译与民族建构》一书选题新颖,立论独到,结构严谨,写作规范,是一部颇具学术参考价值和意义的作品。

下面,笔者从本书所谈“文学翻译与民族建构”这个主题出发,就翻译与民族形象建构或重构、形象学与翻译研究,以及作品所涉及的几个焦点问题谈点个人认识和观点,权当应作者之邀而为本书所作的“序”。

一、翻译与民族建构

在中文里,“民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但其所指和联想或含义何在,我们又未必对它有一致的认识。通常,我们所说的“民族”,可能是指“种族”或“族群”,相当于英文“ethnic group”的所指。种族或族群常以人体的体质形态上的某些共同遗传特征(肤色、发色、眼色、骨骼等)或以其共有语言和文化习俗为标志,属人类学、生物学范畴,如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苗族、土家族、壮族等^①。我们常说“中国有 56 个民族”或“中国民族人口调查”之类词语中的“民族”,实质上也是一个国家的“种族”或“族群”的意思。

本文所谈“民族”“民族形象”以及“民族形象建构/重构”中的“民族”,则不是指上述生物学或人类学意义层面的“种族”或“族群”,而是相当于英文“nation”一词所指的政治、法律、社会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民族”“国家”,亦即梁志芳博士书中所采用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之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说“中华民族”时,指的是包括汉、蒙、藏、维吾尔、朝鲜、苗、土、壮等各“种族”或“族群”(ethnic groups)在内的“Chinese nation”(即中国的“国家民族”)。

^① 徐迅:《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载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8-33页。

根据民族及民族主义研究的主流学派即现代主义学派的观点,这里的所谓“民族”(nation),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均为现代概念。它产生于18世纪晚期的欧洲,后蔓延至全世界^①。有人认为我国“民族”一词的出现,最早应追溯到孙中山于1904年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呼吁》一文。后来又陆续有人考证,认为在孙中山之前,其实已有梁启超、吴汝伦、章太炎、康有为、王韬等人使用过该词。因此,“民族”这个西学用词及相关概念究竟何时引入中国、由谁最先使用,学界并无一致意见^②。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孙中山或梁启超、康有为、王韬等革命家、思想家率先使用该词之后,“民族”、“民族主义”以及由此而生的“中华民族”等词汇,便逐渐成为了中国家喻户晓的用词。

现代概念中的“民族”究竟如何形成,与之紧密相关的“民族认同”有哪些基本特征,学术领域对这些问题一直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 and 解释。斯大林曾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③英国历史社会学家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认为,“民族身份”有五大基本特征:历史形成的领土、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共同的大众文化、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以及共同的经济^④。而以爱尔兰社会学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与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则认为,民族是

① Smith, Anthony D.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

② 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总第70期,2002年,第33-43页。<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70-200107022.pdf> (2016年10月3日查阅)。

③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页。参阅:马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145页。

④ Smith, Anthony D. *National Identity*. Reno and Las Vegas: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14.

“被发明”(invented)、“被建构”(constructed)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是一种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建构物,“民族主义”也只是“一个虚构的政治团体意识”。

由于“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认识也并不为奇。可以说,以上种种观点都各有其道理,是我们在研究“民族”、“民族认同”以及“民族主义”问题时都是可以用以参考引证的。本文从翻译与民族建构或重构之间的关系出发,对于上述“建构主义”的观点尤为肯定。

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的形成有赖于民族成员通过各种文化手段或途径对它进行“想象”与建构^①。霍米·芭芭(Homi K. Bhabha)在《民族与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一书中曾指出,文学参与了民族的“想象”,书写了民族,“民族的形成是一种文化指称(cultural signification)行为,是对社会生活而不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文化表述”^②。质言之,民族建构过程包含了一个文化表述过程,民族成员通过各种文化手段来“表述”、“想象”民族,文学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文化手段。作为文学的组成部分,翻译文学在民族建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翻译是民族建构或重构的一种重要途径。翻译在民族建构与重构过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翻译可以有效地传播民族意识,为“想象”民族提供媒介;翻译可以促进民族语言、民族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翻译还可参与民族身份的建构,增强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中国近代很多政治家、革命家、文学家都非常重视翻译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利用翻译传播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中华民族意识。譬如,梁启超曾倡导小说革命,竭力主张译介外国政治小说,把小说作为“新民”的工具,而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则是“新民”

①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

② Bhabha, Homi K. "Introducti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n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1-2.

最重要目标之一。由于中国传统小说“佳制盖鲜”、“综其大较，不出海盗海淫两端”^①，因此“新民”所必需的新小说应当来自西方。世界其他多个民族形成的历史亦表明，翻译可以为民族意识的确立发挥积极功能。19世纪印度的民族主义翻译活动，特别是科学翻译一度兴盛。当时的印度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科学就是文化，要想使印度进步并摆脱殖民统治，应该用印度民族语言向民众传授科学知识，这一时期印度的科学翻译具有明显的反殖民主义政治立场。“因此，印度19世纪的科学翻译不仅是民族统一、发展民族意识的力量，也是印度抵制帝国主义的一种行为。”^②

翻译作为民族建构与重构的重要文化手段，可以对民族语言(国家语言)、民族文学(国家文学)的形成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族确实可以从翻译中‘获益’。民族主义运动经常利用翻译来发展民族语言与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学”^③。世界众多民族形成的历史表明，翻译可以为民族语言的形成发挥关键性作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圣经》德译本可谓西方翻译史上对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巨大而直接影响的第一部翻译作品。路德认为，真正的翻译是把外国语变成译者的本族语言。他分别从希腊语、希伯来语译出《新约》与《旧约》，以图林根一带比较统一的公文用语为基础，吸收德国中东部和中南部方言的精华，并创造了大量新词汇，使其译文成为德语的典范^④。路德的《圣经》德译本不仅对德国人的生活和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创造了大众能接受

①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4页。

② Ramakrishna, Shantha.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 in Post-colonial India. Meta, 1997, 42(2): 445.

③ Venuti, Lawrence. "Local Contingencies: Transl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Sandra Bermann & Michael Wood (eds.), Nation, Language and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8.

④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16年，第63-68页。

的文学语言形式，对德国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翻译还可在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建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民族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建构起来的。“民族身份不可能在社会中‘自然’形成；它由国家权威人士创造、培育并精心提倡而形成”^①。由于民族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化身份，因此民族身份的确立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包括对文化、传统、自我定位等的重构。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手段，自然会参与民族身份的建构。根茨勒(Edwin Gentzler)认为，任何有关美洲翻译问题的研究，都应该围绕民族身份建构这一问题展开，美洲的翻译史是民族身份建构的历史，翻译以显性或隐性方式存在于每一位美洲人的灵魂之中^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译者在民族建构与重构过程的作用尤为突出。译者作为知识分子与文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利用翻译这个途径，表达他们对民族建构与重构的个人诉求，参与“想象”与建构、重构民族形象。而译者参与“想象”民族或民族形象的最直接方式，就是以翻译为途径，在译作中塑造、建构或重构出符合自身认知与期望的民族形象，以满足个人在民族建构与重构中的诉求。《大地》是一部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更是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题材作品。《大地》的中译实质上是中国人在西方“他者”的提示下对民族自我形象的重新建构，是中国人对民族自我所进行的“再”认识。从这点来看，《文学翻译与民族建构》选取《大地》中译作为研究个案，来探讨文学翻译与民族建构与重构之间的关联，其选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① Watson, J. L. "Rites or Beliefs?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80.

② Gentzler, Edwin.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mericas: New Directions in Translation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80.

二、形象学与翻译研究

形象学(imagology)或形象研究(image studies)原本是专门针对文学以及电影、电视、艺术展览等文化表述形式中的民族形象进行批判性分析的一个学科领域,但其适应范围早已延伸至翻译领域。它的理念和研究成果,对我们研究翻译与民族建构/重构之间的关联,特别是译者如何通过建构/重构民族形象来参与民族建构/重构的问题,极具参考价值。近年来,随着形象学与民族主义理论的不断结合,以安德森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建构”学派有关民族“被建构特性”(constructedness)的观点,使我们对民族形象的“被建构特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如果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那么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形象则应该是相互想象的产物,与原初的“想象”一样都是一种虚构物^①。形象的生成与传播和历史、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连,形象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形象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模拟描述,而是一种话语建构物(discursive constructs)^②。因此,形象研究不能拘泥于文本,更要注重对形象进行语境化分析,考察形象生成的各种历史文化因素。

由于形象具有鲜明的建构性,因此形象学所重点关注的,不是形象的真伪,而是形象如何被建构。正如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所言,形象学“绝不仅限于研究对简称为‘现实’的东西所做的文学置换。它应该研究的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研究那些支配了一个社会及其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动力

① Beller, Manfred. “Perception, Image, Imagology”. In Manfred Beller and Joep Leerssen (eds.), *Imagology: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s—A Critical Survey*.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07: 11.

② Leerssen, Joep. *The Rhetoric of National Character: A programmatic Survey*. *Poetics Today*, 2000, (21): 270.

线”^①。形象学荷兰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勒(Manfred Beller)则明确指出形象学的目标应该为“描绘、揭示、分析民族偏见与民族形象的起源、形成过程与功能,并让人们理性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②。因此,形象研究(包括翻译中的形象研究)应该围绕相关的民族或国家形象如何在文学或翻译文学中被塑造、形象如何变化、形象的作用与意义何在、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形象等问题而展开。

正是基于上述理论思想,《文学翻译与民族建构》一书不像国内一些其他作品那样,拘泥于评判赛珍珠与中译者笔下的中国(主要是中国农民)形象是否真确,或简单地将这个形象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去一一比对,而是通过剖析中国形象与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考察这个中国形象的起源与功能,进而探求赛珍珠与各位中译者在创造中国形象过程中所流露的文化心态与个体动机,以及这一过程所显露的中西方权力关系,从而摆脱关于形象真伪的无谓争辩。可以说,该书围绕《大地》源文本与各个中文目标文本之中国形象的建构或重构所进行的讨论,对翻译文学作品的形象学研究,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三、几个焦点问题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贡献,可以用“文学翻译”、“民族(形象)建构”、“文化回译中的中国形象重构”、“《大地》中译研究”等几个关键词来概括。如前所述,本书作者综合运用形象学和民族建构理论,从《大地》中译研究的实际出发,对翻译与民族建构或民族形象重构的关系展开研究,提出形象学理论视角下的《大地》中译研究模式,并系统

① [法]巴柔:《形象》,孟华译,载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

② Beller, Manfred. “Perception, Image, Imagology”. In Manfred Beller and Joep Leerssen (eds.), *Imagology: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s—A Critical Survey*.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07: 11-12.

运用这一模式阐释《大地》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中国形象如何生成、传播,以及属于“文化回译”范畴的《大地》中译如何参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或民族形象重构等问题。笔者认为,全书的三个焦点即它的三个亮点所在,也就包含在其中:一是厘清“中国形象”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二是从“文学翻译与民族(形象)建构”之间关系的角度对《大地》中译进行系统研究的价值;三是本书所提“文化回译”这一命题的理论意义。下面分别针对这几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首先是关于“中国形象”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对国家形象宣传的重视,“中国形象”研究已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热点。据 CNKI 的“学术趋势”数据,2006 年以来,“中国形象”相关研究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该库 2006 年收录的相关论文为 64 篇,而 2015 年则激增至 277 篇。“中国形象”研究所涉领域相当广泛,包括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心理学等。尽管如此,各学科对“中国形象”的具体内涵所在,却似乎是各说各话,并未形成统一认识。

按照比较文学形象学的阐释,所谓“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综合”^①,而“他者形象”实质上是指“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相互看法和评判,亦即他国他民图像”,自我形象则是“对本国、本群体或自我文化的看法和评判”^②。

该书依此对何为“中国形象”的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作者在书的第二章指出:鉴于形象本质上是一种表述方式、思维方式或话语方式,因此所谓“中国形象”,是指“文学或其他文化表述形式关于中国的人、物、事的心理、话语表述或者看法,它掺杂着关于中国的知识与想象,其本质是表述、阐释中国的话语方式”;而《大地》源文本塑造

① [法]巴柔.《形象》,孟华译,载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

② 方维规:《形象、幻象、想象及其他》,载乐黛云等编,《跨文化对话》(第2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3-254页。

的中国形象是一种他者形象，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自我形象，两者通过翻译联系起来，这个自我形象是对他者形象的翻译。之所以说中译本之中国形象是“特殊”的自我形象，是因为这一自我形象显然与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不同，它是透过美国“他者”的眼睛来审视自我。质言之，《大地》的中国形象是美国对中国他者的一种表述，而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则是中国主体对民族自我的一种自我表述。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中国形象”，尤其是结合《大地》源文本及其中译目标文本之中国形象的阐释，其意义是清晰的，表述是到位的。

此外作者还特别指出，“并不是所有关于某一个体、群体、民族或国家的描述都属于形象，那些客观的、事实性的、不体现对描述对象主观评价的描述，不属于形象学的研究范围。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不包括‘实证性报告陈述’(empirical report statements)——可证实或证伪的论断、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述；形象学所关注的是文化表述方面的内容。例如，‘法国的首都是巴黎’这类描述并不是形象学意义上的法国形象的内容”。也就是说，形象学所关注的，是文学、电视、电影等文化表现形式中的民族形象的起源与功能。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本书对《大地》源文本与中译本之中国形象建构或重构的讨论，摆脱了长期困扰国内外赛珍珠研究界有关《大地》对中国描述真实与否的讨论，而是将《大地》源文本与目标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讨论其中国形象生成的原因、作用与意义。这是值得赞许的。

其次是《大地》中译研究的价值。《大地》是一部在美国(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作品。它是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题材作品，作者赛珍珠更是被美国历史学家汤姆森(James C. Thomson, Jr.)誉为“自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以来描写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①。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中国乃至全世界，《大

① Thomson, James C., Jr. Why Doesn't Pearl Buck Get Respect? Philadelphia Inquirer, 1992.

那么,《大地》中译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又有何意义呢?笔者在上文已提到,译者参与建构、想象民族的最直接方式,就是通过翻译在译作中塑造符合自身期待的民族形象。事实上,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晚清、“五四”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20 世纪五六十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等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文学、艺术领域均涌现了大量“中国形象”书写,作家、艺术家、翻译家们从不同角度去书写、想象中国。“何为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竞相探索的百年命题,如何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重建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新形象成了现代中国人为之奔走呼号的世纪工程。作为这项探索工程的一部分,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自觉地承担起一个使命:以巨大的激情与丰富的想象力去重建中国形象。对中国形象的反复寻找、表述或者重建,成了一个贯穿整个 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世纪性传统与主题。

在 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所承担的这一民族建构的历史使命中,《大地》中译本占据了重要位置。“五四”高潮过后的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20 世纪 30 年代,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重、对中国现实的失望和对它的美好未来的期待,使得这一时期中国语境中出现了大量“中国形象”书写。例如,闻一多的《死水》(1928)以令人愤怒而绝望的“死水”比喻中国;沈从文在《萧萧》(1930)、《边城》(1934)等一系列小说中所展示的,则是远离现代城市喧嚣的纯美、宁静的乡土中国;左翼文学的代表作、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1930)则建构了一个农民阶级奋起反抗封建压迫、积极进取的革命中国形象。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赛珍珠与《大地》之所以能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之所以会出现“抢译”赛珍珠作品的翻译高潮,之所以能引发鲁迅、茅盾、巴金、林语堂等文化名人的关注与评论,除了《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及其在西方国家引起的轰动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大地》的中国形象主题契合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中国形象”书写重建民族的时代主题。

《大地》的中译实质上是中国人对民族自我形象的重新建构，是中國人在西方“他者”的提示下对民族自我所进行的创造性的认知与审美。可以说，《大地》的中译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大地》中译就是中国人根据自我认识，对赛珍珠描绘的‘中国’重新建构或‘修正’，以实现自我认同与自我确认的过程。通过西方（《大地》）的中国形象实现对民族自我的界定，既是一个解构过程，也是一个建构过程。如果说《大地》是一面平面镜，中国人从中看到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那么，《大地》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历史就是一面多棱镜，从中折射出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的自我认识、自我认同的不同面向。《大地》的中译史实乃中华民族自我反思、自我反省的历史过程中的一环。透过赛珍珠，我们得以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过去”。

最后谈谈文化回译的问题。先谈“回译”这个概念。所谓“回译”，有时也称“逆译”、“返译”或“（语义）还原”，按照《翻译研究词典》^①解释，是指“将已译成特定语言的文本译回源语的过程（或结果）”。作为一个译学术语，它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有关《圣经》翻译的文献以及对比语言学的研究中。“回译”作为一种寻根溯源的“文本考证”活动，其价值主要在于可以用它来对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句法、构词法或词汇特征进行比较，特别是对相关的“语义内容”进行“检测”^②，或用它来分析目标文本与源文本之间存在怎样的文本对应关系，以及揭示翻译在本质上究竟存不存在语义上的“可逆特质”^③。可以看出，这里的

① 谭载喜：《翻译研究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原著：Mark Shuttleworth and Moira Cowie）。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2010年，第19-20页。

② Ivir, Vladimir. Formal correspondence vs.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revisited. Poetics Today, 1981, (4): 59.

③ 图里（Gideon Toury）认为，翻译具有不可逆属性，因而译文与原文之间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对等”。（详阅：Toury, Gideon. In Search of Theory of Translation, 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1980: 23-24.

“回译”，应当理解为一种语言层面的翻译行为。例如，将原本译自中文的英文表达形式“long time no see”、“lose face”分别译为“好久不见”、“丢脸”等，或用中文讨论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时，将某段英译文的意思用中文再述出来，以比较葛译与莫言原创之间有何异同等，这些都是针对语言表述而言的。

本书从上述“回译”的基本概念出发，将“文化回译”的理念引入《大地》中译的案例分析中，从而给予了这一研究新的意义和活力。按照作者的解释，赛珍珠的《大地》是一部用英文创作的中国叙事，将它译成中文，让这一中国叙事返回原初故事的中国语境，它构成的是一种“文化回译”（即“回译到”原本属于中国或中国人的叙事语境）。有别于一般回译，即“语言回译”，“文化回译”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原作（如《大地》这类用西方语言创作的中国叙事）在通过翻译这个途径回到原初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原创所叙述的目标文化或目标民族/目标人物形象，在目标文本中如何被呈现或再现出来。因此，从“文化回译”角度探讨《大地》等中国题材英文作品的中文翻译，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虽然对于“文化回译”在《大地》的中译过程中究竟有怎样的具体表现，以及相较“语言回译”，它的最大价值又在哪里等问题，本书并未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但书中明确提出将赛珍珠作品《大地》的中译，定性为属于“文化回译”的范畴来研究，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译学启发意义^①。

当然，除《大地》的中译以外，其他凡是将用非中国语言书写的原创中国叙事翻译成中文，都属于此种“文化回译”。其中既包括小说类，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源文本：*Moment in Peking*）；也包括游记作品，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马可·波罗游记》（源文本：*The Travels of*

^① 庆幸的是，虽然作者在本书中对于“文化回译”的问题着墨不多，但她曾于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此作了较多讨论，可看作对本书相关问题的详细注脚。（详阅：梁志芳：《“文化回译”研究——以赛珍珠中国题材小说〈大地〉的中译为例》，《民族翻译》，2013年，第1期，第10-17页。）